

川湖陝白蓮教起義 資料輯錄

蔣維明 編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川湖陕白莲教起义 资料辑录

蒋维明 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题字：刘云泉

封面设计：夏扬金

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 蒋维明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 字数144千
1980 年12月第一版 1980 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400册

书号：11118·52

定价：0.75元

前 记

清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，清代中叶，曾被封建文人极力美化为“乾嘉盛世”；这真是一个“普天率土，仁声遍洽”的乐园吗？不！揭开彩色的纱帷，可以清楚地看见阶级压迫的斑斑血泪。

自十七世纪末以来，“地方势豪侵占良民田产”，“田之归于富户者，大约十之五六，旧时有田之人，今俱为佃耕之户，每岁所入，难敷一年口食”。^①随着土地的兼并集中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非常突出，“京师如米贾祝氏，富逾王侯，其家屋宇至千数间，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”。^②而穷山僻壤的农民，却只能“伐木支椽，上覆茅草，仅蔽风雨”。淮左扬州产盐之区，盐商巨室日食千金，斗奇竞奢，而“乡曲贫民有积日累旬坚忍淡食者”。^③

这时的清王朝，朝廷上下，已是贪污成风，政治腐败，“吏风益坏”。乾隆皇帝极为宠信的军机大臣和珅，就是一个“贪黷无厌，征求财货，惶惶如不及”的人物；他还在北京经营高利贷，“以首辅大臣，下与小民争利”。和珅抄家后，其家产折合白银八亿两，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收

入，占地八十万亩还未计算在内。上行下效，蔚为风气，四川建昌道石作瑞上任不久就侵蚀帑银至五十余万两；一次，某大员出巡至建昌，石作瑞赠送他珍珠三斛，蜀锦一万匹。

在官吏、豪绅巧取豪夺、敲骨吸髓的盘剥下，许多农民被迫鬻儿卖女与富室为奴。奴婢的命运更加悲惨，“饥寒切于中，鞭扑加于外”，常有饮恨自尽者。康熙初年，刑部尚书朱之弼疏言：“臣见八旗仆婢每岁报部自尽者不下二千人”，④平均每天自杀者多达六人，而未报刑部者，更不知凡几。乾隆中某驸马“家挞死奴婢无数，皆自墙穴弃尸出，其父母莫敢诘也”。⑤

一遇天灾人祸，农民多背井离乡，四出流亡。嘉庆即位不久，“流民散处（北京）城内外者，以万亿计”。⑥流民中的一部分，汇集在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。据《三省边防备览》描述：“流民之入山者，北则取道西安凤翔，东则取道商州郧阳，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。扶老携幼，千百为群，到处络绎不绝。不由大路，不下客寓，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中住宿，取石支锅，拾柴作饭。”南、巴老林是三省犬牙交错的地方，“路歧如麻”、“咫尺隔省”，高山长林，弥望蓊郁，绵亘千余里，竟日不见人烟。流民进入这里，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，被称作“棚民”。他们租种地主的一片荒地，勤耕苦作，浸透血汗，眼睁睁盼到收获，或可一饱饥肠？谁知盼来的却是“债主踏田收籽粒，板桶声停已断粮”，“连年丰收尚如此，水涝旱蝗将何恃？”⑦

为了糊口，有的棚民来到山里的木厂、盐厂、香菌厂、纸厂、铁厂、煤厂作工，担任搬运的脚伕，负重常在二百斤以上，厂主称他们为“骡子”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；歉收粮贵，又常遭解雇失业之苦。此外，差役兵弁不时对他们敲诈勒索，“山民受其凌虐，无可申诉，无为申理，噤然无复有生之乐。”^⑧压力愈大，反抗愈强，蓄之既久，其发益猛。川湖陕边是一座沉默的火药库！而乾隆末年对白莲教徒的搜捕和镇压，点燃了导火线。终于，在嘉庆元年（公元1796年），正当以“十全武功、五世同堂”自诩的乾隆皇帝“功成身退”、举行“内禅”大典后不几天，川湖陕边区广大农民、手工业者以白莲教的组织形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。饥民们用剑与火，把“天堂”的缺口打开了。从此，清王朝基础动摇，“由盛而衰”；从此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一蹶不振，逐渐坠入没落的深渊。

二

白莲教杂拜各种鬼神，是一个揉合道教、佛教、摩尼教（明教）、迷信色彩相当浓厚的秘密的“异端”教派。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在民间广为传播。元明两代，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来组织起义的队伍，著名的如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，明升在四川的起义；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；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的起义；天启年间山东徐鸿儒的起义；乾隆中山东的王伦起义。义军的英风烈绩，给川

湖陕人民留下深刻影响。襄阳附近各县流传着白莲教徒帮助农民种地，替受虐待的妇女磨面等传说。川东一带，蔡伯贯聚众造反、纵横驰骋于合州、大竹、铜梁、荣昌、安居、定远、璧山七州县的故事，在苦难深重的农民心里播下反抗的火种。

白莲教原始教义的某些内容，寄托了农民、手工业者朴素的政治理想。教徒们深信“红阳劫尽，白阳当兴”、“清朝已尽”；光明将要代替黑暗，清王朝将要灭亡。他们宣称，信教的可以分得土地，“不携貲粮，穿衣吃饭，不分尔我”，“习其教者，有患相救，有难相死，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”。^⑨白莲教主张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，宣传其经文的唱词中有“或是男或是女本来不二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”；“吩咐合会男和女，不必你们分彼此”。教徒们通过给穷苦人治病、传授武艺、教练气功等方式，广泛联系群众，扩大政治影响。白莲教宣传的这种“平等”“平均”的理想社会，反映了处在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下的广大农民、手工业者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；其宣传推翻封建王朝、实现均田的革命主张，极大地鼓舞了起义斗争的士气。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这些理想不可能实现，然而“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，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，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。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和进步的，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。”^⑩

公元1775年，乾隆皇帝把白莲教首刘松捕押到甘肃充

军；公元1793年又通缉捉拿在川湖陕边传教的刘松的弟子刘之协、宋之清。同时，在全国各地对白莲教徒进行大搜捕、大屠杀。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命查办宜都教案，“一意苛求，凡衙署寺庙，关锁全满……各令纳钱若干释放，其有少得供据者，立予惨刑，至以大铁钉入手掌于壁上，或铁锤排击多人，足骨立断。”^⑩达州知州戴如煌，贪劣残暴，为了混水摸鱼、乘机勒索，私设的衙役竟达五千名之多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！川湖陕边席卷数省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！

三

嘉庆元年（公元1796年）正月，湖北宜都、枝江两县人民在张正谟等率领下，揭竿而起，首先发难。接着，白莲教起义的烈火蔓延到长乐、长阳、当阳、远安、来凤等地。二月，湖北重镇襄阳城下，王聪儿、姚之富响应起义，风驰潮涌，声势浩大，把反抗清朝的斗争推向新的阶段。

王聪儿，湖北襄阳人，家境贫苦，从小就流荡江湖，学习跑马卖解的杂技艺术，尝遍了人生的颠沛流离，同时锻炼了她坚强不屈的英勇性格。她的丈夫齐林是白莲教襄阳郢阳一带的总教师。王聪儿、齐林等原订在嘉庆元年元宵灯节时起事，不料失密，齐林等一百多人被残酷地处死。王聪儿幸免于难，与齐林的徒弟姚之富等数千人会集于齐林的故乡黄龙荡，在高呼为烈士报仇的口号声中插旗造反。王聪儿被推

为“总教师”，时年十九岁。义军转战在湖北河南交界的地区，很快扩充到数万人。随即挥师南下，攻克孝感。清朝官兵惊恐万分，湖北首府武昌也宣布戒严。待敌人调军来攻之际，义师又挥戈北上，进逼光化、谷城，围河南巡抚景安于鄂豫交界处的魏家集二日。义军流水疾风、机动灵活的奔袭，使清军穷于应付，疲于奔命。

在湖北起义军的推动下，嘉庆元年九月，四川人民在徐天德、冷天禄领导下，以达州、东乡（今四川宣汉）为中心，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大起义。

徐天德“世业农，尝充本州役，缘事斥革，习白莲教”。通过捕鱼人李某（一名通惠人）“沿江往来，联络勾结，传报信音”，“故天德与湖北贼消息常通”。^⑫遂与徒众约期举义，“远近同挈妻子来者数百家”，义军在旬日之间扩充到一万多人。与此同时，东乡的冷天禄、通江的冉文俦、冉天元等也都乘时而起，领导当地人民起义。

川楚人民大起义的烈火，迅速蔓延，陕西省的冯德仕、林开太、王可秀等崛起安康。至此，南巴老林，怒火烛天，燃成一片。

清王朝统治者在人民大起义的怒潮冲击下，惶恐不安，四处调兵遣将，组织围剿。湖北战场上，命永保总统湖北诸军，湖北巡抚惠龄、陕甘总督宜绵等助剿。无奈走狗不卖力，专知尾追，不敢迎击，河南巡抚景安更是怯战，“避匿城中，闭门不出”，署四川总督英善、成都将军勒礼善，亦屡为达州义军所败。公元1796年11月，徐天德指挥义军全歼

了前来追剿的重庆镇总兵袁国璜部、陕西兴安镇总兵何元卿部。

公元1797年初，襄阳起义军为了摆脱湖北战场蜂拥而至的数万清军主力，为了与四川义军协同作战，决定作战略大转移。在王聪儿的率领下，入豫西，奔陕南，然后出敌不意，进入四川。公元1797年5月，襄阳起义军胜利结束了纵横四省的千里长征，来到了东乡附近。湖北、四川起义军中的两大主力胜利会师了。两军队伍，旌旗招展，声威赫赫，屯扎三十余里。

齐姚大军入川，为的是加强各地义军的联系，似乎还想建立义军的统一指挥部。东乡会师后，义军各支队伍按地区统一分编为黄、蓝、青、白等号（如“襄阳黄号”、“达州青号”、“东乡白号”等），并在军中设置掌柜、元帅、先锋、总兵等领导职务。东乡会师，迅速扩大了义军的影响，六月，云阳林亮功、奉节龚文玉率领群众响应起义。各路义军以燎原之势，控制了川东川北二十余州县的广大农村。

然而，就在东乡会师的前后，义军面临着外敌内奸的两面夹攻：既要与清军刽子手作拚死的浴血奋战，又要同义军内部的变节投降者挑拨离间、内里蛀空的言行作斗争。

义军内部变节投降的代表人物王三槐（公元1764——1799），四川东乡人，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游民，“素业巫祝，为人祈祷，贩卖私盐，赌博无赖”。公元1796年春，由于他的父母妻子遭牵连被捕入狱，王三槐逃出在外，为营救家人、寻找出路，他参加义军，与冷天禄起事于东乡，取得

重要职务。清廷为了消灭义军，施展镇压和“招抚”两手并用的反革命伎俩，物色、引诱义军中不坚定分子作为归顺朝廷的带头羊。王三槐这个“身在江湖，心存朝廷”的人物，适应了清王朝瓦解义军的需要，当王聪儿、姚之富率部入川之时，王三槐挑拨离间地说：“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的人来糟踏”、“不肯与之合伙。”^⑩更为恶毒的是王三槐还秘密策划暗杀齐、姚，向清朝“献功”。只是由于“人心不齐”，遭到冷天禄为首的广大义军的抵制，他的阴谋才未得逞。由于王三槐一伙的阴谋活动，使东乡会师没有完成建立统一指挥部的重要目的，几路义军仍“各不相率”，“教同党异”，给清军提供了分而剿之、各个击破的方便。所以，当清军惊魂甫定，立即跟踪而来，妄图聚歼义军于川东。王聪儿当机立断，决定避实捣虚，率襄阳起义军主力沿江东下。在白帝城下，义军与扼守要道的清军激战三昼夜，王聪儿身先士卒，“燃炬夜攻，更番迭战”。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义军健儿顺利地突破了敌人防线，回师湖北。清政府慌忙下令汉江戒严。义军复于郢西境内大败清军，击毙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。牵着清军鼻子，绕了一个大圈，拖得清军人困马乏，“徒劳兵勇力，疲于奔命焉”（《御制诗》初集）。

随后，襄阳义军于公元1797年冬再入陕南，二进四川，以走制敌，流动作战。公元1798年春，王聪儿率步骑两万北上，经宝鸡、岐山而东，攻郿县，战周至，威逼西安。吓得陕西巡抚秦承恩胆颤心惊，“惟闭城独守，日夕哭泣，目皆

肿”。丑态百出。

不幸，王聪儿的先遣部队与敌总兵王文雄遭遇。王文雄设圈阵于焦家镇，“四向铙炮、外列矛矢佐之”，义军受挫，遂东走郧西。但这次进军和川陕各部相距太远，以孤军深入，被围困在三岔河。清军主力德楞泰、明亮、赛冲阿、阿哈保等八路强敌，步步为营，以逸待劳，在兵力对比上占了压倒优势。义军虽“抵死抗拒”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弹尽粮绝，被逼上陡峭的悬岩。王聪儿、姚之富率领剩下的战士，视死如归，相继跳岩就义。“时穷节乃见，玉碎色犹白”，二十二岁的王聪儿，短促而悲壮的一生，壮民族之英风，抒妇女之豪气，表明了中华儿女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！

王聪儿、姚之富牺牲，义军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。这时，襄阳义军余部二万余人重返四川，与四川义军会合，危而后济，力图恢复。而一小撮投机分子，却被敌人血淋淋的屠刀所吓倒，把投降的希望变为投降的行动。公元1798年7月，王三槐不顾冷天禄、徐天德为首的义军弟兄的忠告和反对，向新任四川总督、经略大臣勒保“哀求投顺”。勒保将王三槐拘捕，以“阵俘”奏闻。嘉庆皇帝命令押解至京亲自审讯。王三槐在招供中交待了起义军主要领袖十余人的详细情况，同时向清廷献策，哪些当“剿”，哪些宜“抚”；并乞求给自己封官赐爵，广泛宣传，让他这个无耻叛徒充当带头羊，引诱义军中动摇分子接受招安。然而，和历史上其他一些叛徒同样，当清朝统治者发现这匹断了脊梁的走狗，已

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时便将他抛了出来，于1799年二月凌迟处死。

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。清王朝的血腥镇压虽然吓坏了几个胆小鬼，却激起广大人民更强大的反抗。王聪儿死后，以四川起义军为主力的各部义军前仆后继、坚持战斗。罗其清、冉文俦驰骋于川北；杨开甲、张士龙活动于甘肃南部；樊人杰、龙绍周、高均德、冷天禄转战在川湖陕边。而四川义军中的冉天元、徐天德尤为反清斗争的中坚。冉天元轰轰烈烈的战绩，徐天德坚韧不拔的节操，足与王聪儿叱咤风云的豪情交相辉映，鼎足而三。

冉天元是通江义军首领冉文俦的侄儿，绰号“扫地王”。公元1798年底，冉文俦在一次突围中壮烈牺牲，青年将领冉天元接过战旗，由大巴山麓，西征苍溪，“号令川东北群寇，横行数省”，“屡设奇计，以陷官军”。大刽子手、继任经略大臣额勒登保把他引为“心腹巨患”。冉天元部“所过州县，恒不血刃而下”。1799年冬，与额勒登保激战于苍溪，重创敌将穆克登布，然后凭高驰击，直捣额勒登保中军营，毙清军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名。迫使额勒登保这个所谓的“常胜将军”诚惶诚恐地向他的主子“请罪”。

公元1800年（嘉庆五年）初，冉天元又与兄弟部队合谋，围清军主力朱射斗部队一千多人于蓬溪县境的高院坝。

“四集云合，围数十里”，一举将敌全歼。朱射斗绰号“朱虎”，是一个“骁勇敢战、屡立功勋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，他的覆灭，使清廷震动，“兵民无不丧气”。

公元1800年三月，冉天元在江油马蹄岗与清军参赞大臣德楞泰遭遇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战。冉天元设伏数重，诱敌深入；伏兵骤起，锐不可挡。义军弃马步战，“人持束竹湿絮御箭铙，鏖斗三昼夜，鼓声动地，烟尘弥天”。^⑭清军又饿又渴，数路俱败，德楞泰只剩亲兵数十，困守山巅，预感到死亡的来临，“天元率众登山，直取德楞泰……”，“万丈狂澜争一霎”，不料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地主武装罗思举领乡勇四千多人由后山赶到，冉天元功败垂成，不幸被俘遇害。这次大战，敌人虽然侥幸获胜，然而义军五日四战的赫赫战功，冉天元雄姿英发的形象，常使敌人心有余悸、谈虎色变。

徐天德为首的达州青号义军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力军之一。在四川十多个义军首领中，徐天德起事最早，活动地区最广，坚持斗争时间很长；慷慨捐躯，亦如王聪儿、冉天元之壮烈。然而，在以往流传于四川的民间传说、曲艺说唱节目中，却张冠李戴地把王三槐作为义军的代表人物加以颂扬。对这种历史的颠倒，应当正本清源，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。下面我们对徐天德的战斗历程作一番具体的考查：

东乡会师后，徐天德致力于推动、扩大四川的起义。嘉庆二年（公元1797年）十月，徐天德率领的义军假冒总兵朱射斗的旗号，智赚清兵，巧取通江。随即进军营山，围营山县城三日，待敌援军将至，义军又主动撤围，转战渠县、大竹、邻水；趁清军四处扑空，疲于奔命之际，一举攻克了长寿县。长寿县令闻风先遁，守备夏继先被当场击毙。接着，

义军马不停蹄地攻克了开县首镇临江。徐天德、冷天禄、樊人杰、张汉潮、王光祖等部数万人在这里胜利聚会。临江镇“列肆数千家，夙饶裕”，义军“日夜宴犒歌舞”，^⑮迎来了1798年战斗的新春。

公元1798年初，王聪儿部由南山老林出发，经宝鸡，战周至；复回师湖北，在三岔河遇难。这一段时期，徐天德转战川东川北，始终没有停止战斗。他主动派曾柳往梁山、万县联络新起的义军郭长俊、伍一凯部；又策应云阳教首高名贵。八方串连，四处点火，扩大义军的声势和活动地域。公元1797年底，四川总督宜绵无可奈何地奏道：“惟四川之贼，川东则夔州、重庆、达县、忠州，川北则顺庆、保宁，臣所有之兵，东驰西击，日不暇给。”^⑯

嘉庆三年（公元1798年）三月，王聪儿壮烈牺牲。六月，王三槐叛降。一时之间，黑云密布；血雨腥风，铺天盖地而来。在这极为困难的时刻，徐天德表现了可贵的革命坚定性。他高举义旗，毫不动摇，战斗在忠州、丰都、合州、定远（今武胜县）、涪州等地。

嘉庆四年正月，徐天德率众数万，乘凌晨大雾弥漫，偷渡渠河，击毙渠县地主武装廖元瀚等二百余人。同年二月，在长寿县云台铺，徐天德部围攻清军主力德楞泰整整一夜；次日，撤退至平井铺，诱敌来追，徐天德指挥义军中的妇女，“伪据市肆，具酒茗以待。官军前队至，正饥渴，饮食之”；伏军骤起，清军前锋悉数被歼。

嘉庆四年，战争形势逐渐发生重大变化。四年正月，太上

皇乾隆死去，嘉庆从此得免掣肘之苦，迅速将乾隆宠信的权臣和珅处死；诏责统兵诸臣，老师糜饷，久延岁月，决心整饬戎行。积极推行恶毒的“坚壁清野”、“筑寨团练”政策，“并小村入大村，移平处就险处，深沟高垒、积谷缮兵”，分派官吏组织团练兵丁、清查户口，“安民然后杀贼”。同时，更加重用汉族地主武装。寨堡政策先试行于川东川北，到这年下半年，已开始收到统治者预期的反革命效果。地方官吏惊喜地奏报：“川东北团寨谨严，无可掳掠”，“结寨团练，自为守御，贼无所掠，其势穷蹙”。此时，节制五省的经略大臣勒保提出把义军逼至川北、聚而歼之的阴险的计划。

所以，从嘉庆四年下半年开始，义军反其道而行之，退出川北，向东西两侧进袭。冉天元部离开川北向川西挺进，拟向陕甘边境发展；徐天德部由川东向湖北方向转移。

为了跳出清兵在川北布置的包围圈，徐天德率部东进，艰苦备尝。义军经太平进入巴山老林，“时，冬雪未化，久雨泥泞，无从觅食，饿死冻死甚众”。恶劣的环境并未消沉义军的斗志，徐天德同将领们商定了回师袭击夔州营的计划。不料混在义军中的不坚定分子，在困难面前，变节叛逃：四年六月，叛徒赵耀宗杀死义军将领一人降清，清廷赏予八品顶戴；赵耀宗密报了袭击夔州的计划。同时，清军又从变节的俘虏中，物色到曾任义军元帅的李甲，纵之回营，令招其党，“于是降者日众”。

外有清军的追剿，内有叛徒的破坏，在反革命逆流汹涌

而来的严重时刻，徐天德丝毫没有被吓倒，被屈服；达州起义军犹如巴山劲松，傲雪凌霜，矗入云天。嘉庆四年七月，徐天德率领义军进入湖北竹谿，随即活跃在川楚边界，粉碎清军的围剿计划，保存了义军的有生力量。嘉庆帝受此沉重打击，恼羞成怒，急令尚书魁伦入川，将纵徐天德入楚的经略大臣勒保逮捕回京治罪。

嘉庆五年，徐天德部在川湖陕边牵制了大股清军，以游击战术先后击毙清朝总兵官李绍祖、王凯以下多人。六年二月，嘉庆又诏令全国，以重金购徐天德等五首领。诏令称徐天德等“……为起事首犯……元恶大憝，不容覆载，万无自首贷以一线之理，惟有刑兹无赦”。^{①⑦}刽子手的刀光剑影，

“牧师”的念念有词，动摇不了义军首领的钢铁意志；“万无自首贷以一线之理”这出自敌人口中的绝望的哀鸣，从反面衬托了徐天德坚韧不拔、百折不屈的忠贞亮节。

嘉庆六年六月，徐天德在陕西紫阳县境被德楞泰、赛冲阿、温春的重兵追逼；时，暴雨如注，大水横阻，徐天德决不愿落入敌人的魔掌，投河欲渡，不幸在仁和新滩溺水牺牲，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反清的壮歌。“他们虽败犹荣，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复仇的渴望，而在革命时期，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。”^{①⑧}

徐天德死后，义军余部仍坚持战斗，他们利用老林的有利地形，忽川忽陕，使得清王朝“三省不得解严”。一直坚持到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，历时九载，席卷五省的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才被镇压下去。